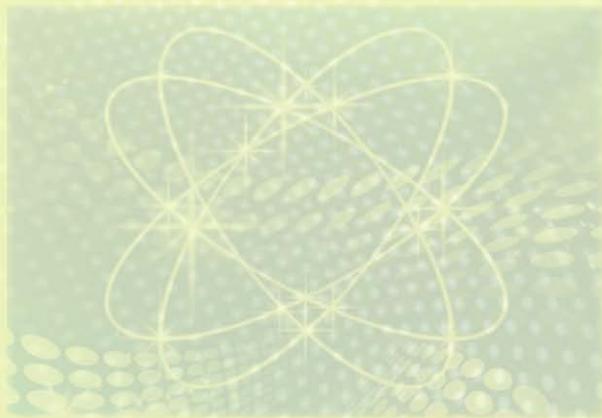


史源、神话与文化重构



目 录

上 编 大禹生成史的学术考察

第一章 信、疑之间：从禹史论战看“层累说”的释古意义	(3)
第一节 顾颉刚的疑古精神与“层累说”	(4)
第二节 多元视域下的禹史论战	(7)
第三节 “层累说”的重新表述及其释古意义	(16)
第二章 禹史溯源：边缘视野下的夏禹传说之蠹测 ..	(20)
第一节 禹史“中原中心观”之批判	(20)
第二节 纵目人、蜥蜴、禹	(23)
第三节 禹乃西鄙之人	(29)
第四节 杜宇即禹	(37)
第五节 古蜀神话、大禹传说与华夏文明	(56)
第三章 神人合一：大禹神话的史学解读与文化阐释	(61)
第一节 夏禹传说的典范意义与学术价值	(61)
第二节 大禹神人身份的史学解读	(66)
第三节 “人王化”趋势：中国神话的尚德精神与叙述 传统	(75)



第四章 族群互动：大禹传说的地域播迁与民族融合	(79)
第一节 族群互动视野下的大禹研究之现状	(80)
第二节 族群互动与部族联盟——“禹娶涂山”的历史背景	(84)
第三节 “禹兴西羌”考辨	(87)
第四节 徐夷、三苗与禹族	(91)
第五节 族群迁徙与民族融合	(95)

下 编 大禹生成史的文献考察

第一章 六艺经传类	(101)
《诗经》	(101)
《尚书》	(103)
《礼记》(《小戴礼记》)	(116)
《大戴礼记》	(118)
《左传》	(121)
第二章 史书类	(126)
《逸周书》	(126)
《国语》	(128)
《战国策》	(133)
《古本竹书纪年》	(136)
《今本竹书纪年》	(139)
《世本八种》	(142)
第三章 子书类	(147)
《论语》	(147)

《曾子》	(148)
《子思子》	(148)
《孟子》	(149)
《荀子》	(153)
《墨子》	(160)
《庄子》	(167)
《文子》	(170)
《鹞冠子》	(170)
《列子》	(171)
《慎子》	(172)
《商君书》	(173)
《韩非子》	(173)
《尹文子》	(175)
《尸子》	(176)
《吕氏春秋》	(176)
《鬻子》	(182)
《管子》	(183)
《晏子春秋》	(185)
第四章 诗赋、数术、方技类	(186)
《楚辞》	(186)
《山海经》	(188)
《黄帝四经》	(192)
参考文献	(193)
后 记	(201)

上 编
大禹生成史的学术考察

[]



史源、神话与文化重构——大禹生成史的学术与文献考察



第一章 信、疑之间：从禹史论战看 “层累说”的释古意义

1923年，顾颉刚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一文中表达了想要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想法，并举出禹的问题进行讨论，由此引发“古史辨”中的第一场论战。^①围绕“禹”的问题，不同的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并表现出以下几种取向：信经书与疑经书、信古史与疑古史。在反古的背景下，信经书与疑经书体现的不是反古程度的不同，而是根本上的对立^②；信古史与疑古史虽然表面上是本质的不同，但实际上却只是取向上的不同。这使他们之间的讨论颇有“各说各的”之意味，一时蔚为大观。在这种辩论气氛之下，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一方不仅要与信经书一方辩论，还要与以考古学为主的信古史一方辩论。

顾颉刚先生坚持己说并对禹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至

^① 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9~66页。

^② 梁启超认为，“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而“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140页）。可见，反古相对于“以复古为解放”有着本质的不同。



与童书业先生合作完成《鲧禹的传说》而作一总结。^① 杨宽先生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中虽然就禹的问题没有提出实质性的见解，但其提出的“神话分化说”却是“层累说”在疑古的思路下对上古史进行讨论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变型。^② 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所提出的“层累说”虽然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但因疑古过度而使它并未得到本来应有的释古的功用。目前，在“走出疑古时代”^③命题背景之下，回溯“层累说”的历史语境，进一步阐发“层累说”在疑古思路以外的学术价值，或许可以作为走出“疑古”思潮的一种可行之法。^④

第一节 顾颉刚的疑古精神与“层累说”

1923年，顾颉刚在《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九期《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一文中指出，他欲比崔述更进一步地辨古史：不做“儒者的辨古史”，而要做“史家的辨古史”，并认为应该抛弃“经书即信史”的成见，所以，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事应当看她最先是怎样的，以后的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我们并没有实物上的证明，单从书籍上入手，只有这样做才可得一确当的

^① 顾颉刚、童书业《鲧禹的传说》，《古史辨》第七册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2~195页。

^②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第七册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53~365页。

^③ 这一命题是李学勤先生首次提出的，并且以专著的形式对其作了全面阐发。详见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又见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谈“信古”、“疑古”、“释古”，陈其泰、张京华主编《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44~467页。

^④ 按：本书仅欲从古史辨对禹问题的多元讨论来分析“层累说”的历史语境，并就禹的研究提出“层累说”可能具有的释古意义进行反思，以起到提出问题与提携主题的作用。

整理，才可尽我们整理的责任”。基于以上思考，他意欲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时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①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他最终要做的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②顾颉刚以禹的问题为例，认为“自西周以至春秋，那时人对于古代没有悠久的推测”“商、周只是以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始祖，并没有很远的始祖存在他们的思想之中。他们只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而他们在始祖之外，便有一个上帝派下来的神，而不是人的“禹”。禹此时与夏、尧、舜并未发生什么关系，只是来源于九鼎，并通过三代相传的九鼎而成为夏的始祖。禹于是被加于商周之上，使夏、商、周一系而成。^③

王汎森先生认为“古史辨运动在中国疑古史上之所以特别地突出，倒不只是因为否定古书古史的程度上有轻重广狭之别，而是古史辨一开始就带有全盘抹杀上古信史的精神——在没有逐步地检视每一件（或大部分史事）前，就先抹杀古书古史。这种疑古精神主要是继承清季今文家的历史观而来的。”^④顾颉刚提出的“层累”说明他的确将疑古精神落到实

① 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9~66页。

② 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7~105页。

③ 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1~63页。

④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217页。



处，亦将“层累说”提升到方法论与思想观念的意义上。这种方法与观念的形成，概括而言，主要有如下三个原因：一是清季以来疑古思想的集成与爆发；二是“五四”运动后，要求改变传统社会政治模式的时代主题与思潮的影响^①；三是新史学方法如进化论史观、实用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可见，历史传统、现实诉求与学术研究的交互作用造就了顾先生“疑古”的反传统治史理念，“层累说”遂缘此而生。

根据学界“信古”“疑古”“释古”三种思潮，顾颉刚认为：

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释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释古派所信的真古从何而来的呢？这只是得之于已故者之整理抉发。……释古派认为我们讨论的结果为得古史之真相，所以用来解释社会发展史了。同样，我们当初为什么会疑，也就是因为得到了一些社会学和考古学的智识，知道社会进化有一定的阶段，而战国秦汉以来讲的古史和这标准不合，所以我们敢疑。^②

据上可见，顾颉刚对信古一派持全盘抹杀的学术态度。他认为信古者信的是伪古史，自己之所以敢疑，在于得到“一些社会学和考古学的智识”。顾先生所言之“社会学”显然是指向“社会进化有一定的阶段”之论，而考古学则指向能够坐实的上古史，其关注点在于“战国秦汉以来讲的古史和这

^① 梁韦弦《由夔公盃反思疑古学者古史研究方法》，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18~122页。

^②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标准不合”。这同他自我定位为战国秦汉史的古史专家是一致的。^①

通过分析顾颉刚的学术观点，我们可以发现，虽然顾颉刚是在没有逐步地检视每一件（或大部分）史事前，便率先抹杀古书古史，但是，这种古书古史在顾颉刚的观念中依旧是发展着的，顾颉刚关注的焦点正是发展中的“战国秦汉以来讲的古史”，这正是其“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的真正指向。所以我们不得不说，顾先生提出的“层累说”，与其说是为了疑古，不如说是为了更好地释古。只是以后见之明来看，顾颉刚认为这种发展在战国秦汉间因某些书籍的写定而停止了，使他没能开创出更广阔的空间。同时，对于古史先入为主的信与疑导致的观念上的对立，阻碍了对“层累说”的深入探讨。

第二节 多元视域下的禹史论战

关于顾颉刚的疑古精神及其“层累说”，参与“古史辨”的学者大都表示赞同。但对于禹史问题，各家则持有不同的学术观点。根据当时学者的论争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疑经书与信经书之争

钱玄同在给顾颉刚的回信中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自己由疑尧舜更进而疑禹的真实性了。可见钱玄同在顾颉刚之前没有找到证据证明禹不存在，

^① 吴少珉、赵金昭主编，张京华、张力等著《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95~111页。



仅是持怀疑的态度。钱玄同随即又阐明他对“经”的态度：“我喜欢研究所谓经也者，但我很是惑经”，这和顾颉刚所说的没有“经书即信史”的学术观点是相通的。^①有学者指出，“疑古之风演变成一种潮流，虽数顾颉刚出力最多，但钱玄同才是灵魂人物，唯有他的辨‘伪事’更甚于辨‘伪书’的明确主张，疑古作风才进入史学的领域”^②。可见，顾颉刚的“层累说”及其对禹的讨论不仅将疑古重心由辨“伪书”转向辨“伪事”，并以实际的案例证实了辨“伪事”的可能。这不仅增强了疑古一派的学术热情和理论自信，而且对信古一派的思想冲击远较辨“伪书”大得多，深刻得多。

刘澹葵表示同情顾氏的研究精神、疑古精神，但随即以顾颉刚的方法来驳斥他的立论之说：（1）顾氏认为“禹敷下土方”一句中“下土”是“上天”的对言，认为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而不是人，刘氏类此而作推论，以为果如是，则契、汤、文王皆是神而不是人。（2）顾氏以《生民》为西周作品，在《长发》之前还不曾有禹的观念。刘氏认为，因用不到禹的事儿不将禹牵入诗去，是不能得出作此诗的人那时没有禹的观念的结论。（3）顾氏以禹夏没有连称，便认为禹夏没有关系；刘氏指出，那不过是借禹敷土来表明商创国的时候并无感谢禹的意思，并无开天辟地的意味。（4）刘氏认为，顾颉刚是《说文》迷，其想入非非、任情臆造的附会，“真是奇得骇人了！”以禹为虫只不过是名字假借之说，我底臆想却相信人类知识文化到了能采金铸鼎，而铸鼎又象物的时期断不会没有

^①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7~69页。

^② 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载《中华文化》，1995年第2期，第226页。

文字，断不会没有铸鼎人的名字和事业流传下来。^①

胡堇人亦表示“近来国内许多有名学者对于古史都取怀疑的态度，这是我们最赞成的。不过古史里比较稍近事实的地方却也不少，不能一概抹煞”^②。相对于刘揆葵，胡堇人不仅从书上入手，还从提出岫嵎碑这一古物来说明他的观点。且不说岫嵎碑的真伪，但至少体现出他想从一些可以落到实处的证据对禹问题及古史材料进行讨论。他认为“古史虽然庞杂，只限尧舜以前，若尧舜以后的史料，似乎比较稍进事实。”他罗列了三条证据来佐证其观点：（1）史官世传，史料保存较易。（2）古人一命以上每铸造重器，各有款识流传下来，恰是考古的好资料，所以历代学者多很注意。故历代学者会参考文字，不会把九鼎上的虫类忽然移到铸鼎人身上作为那种人的名字（按：有专指禹的倾向）。（3）《尧典》的天象和春秋时代不同而暗合岁差的公例，因而《尧典》不能是春秋以后造出来的伪作。^③

刘揆葵直接从具体论证入手，反驳顾颉刚的观点，大致暗示其对经书的一种认可。胡堇人认为尧舜以前的古史庞杂，而尧舜以后的古史是“比较稍进事实”的，此种判断亦基于他对经书的认可。

针对刘揆葵、胡堇人的辩驳，钱玄同指出他们颇有信经的色彩，并申说“我们研究的时候应该常持怀疑的态度才是。我们要是发现了一部书的可疑之点，便不应该再去轻信牠，尤

① 刘揆葵《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论古史书〉的疑问》，《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82~92页。

② 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3页。

③ 胡堇人《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3~96页。



其不应该替牠弥缝。”^①与此同时，顾颉刚坚持运用其“层累说”，并对禹的怀疑提出更细致的分析，主要有如下四个问题：

(1) 禹是否有天神性。顾先生的基本观点是：禹平水土是受上帝命；禹迹很广；禹敷土、甸山、治水，这些均非人力所及；禹是一个耕稼的国王。

(2) 禹、夏关系。《诗》《书》《论语》皆未明载，直至战国中叶始盛，《左传》《墨子》《孟子》等书遂见夏禹之踪迹。怎可让他相信？

(3) 禹的来源。顾先生说“我于此并不抗辩，因为这原是一个假定。”继而提出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之假定。

(4) 禹起自西周中期，尧舜起自春秋后期，他们产生关系起自禅让之说，而禅让说乃是战国学者受时势刺激在想象之中构成的乌托邦。^②

刘澹葵随即再次质疑顾颉刚，表示他“对于古史之采取察传的态度，看之以情验之理，断之以证”。针对钱玄同的批评，申说自己对经是“于可信者信之，不可信者还是不信”。在表达这些观点之后，对禹的问题应落到更细处，甚至是一字一字的分析解释上。^③

分析各家的学术观点，基本呈现出“疑经书”与“信经书”两种取向。刘澹葵、胡堇人虽然也承认经书中有不可信

① 钱玄同《讨论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105页。

② 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133页。

③ 刘澹葵《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186页。

之处，但根本出发点在于“信经书”，故从经书之中寻找古史的真相。钱玄同、顾颉刚二先生对经书持彻底怀疑的态度，是对经书进行否定后的再整理。可见，先入为主的态度是他们交锋的根本所在。至于禹的问题，似乎已成为双方阐释己说的试验场，从而失去了作为一个真实学术问题的独立性。此外，这种错位的讨论不仅在学术观念上表现出明显的对立，而且在具体论点的辨正上亦渐趋琐碎。胡适便敏锐地观察到这一“异化”趋势，继而出面指出，顾颉刚只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的，并申说，禹不过是个例子，而“层累说”才是本质的问题。^①

顾颉刚在《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文中，针对禹的来源问题，明确说“这原是一个假定”，他的其他论点也多有推论之意。可见，这种“假定”之法应是受到了美国实用主义史学的影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即便顾先生的每个具体论点可以完全被驳倒，但由这些具体论点相结合构成的系统的表述——“层累说”——却无法被彻底冲击。这便是为何诸家批评都没有对顾先生造成很大的影响，反而为其提供了逐渐修正观点的辅助材料。

胡堇人寻找证据以证明古史可信的努力，可以看作是寻找一种可以和“层累说”相对抗的系统表述之尝试。但因观念对立，他的观点并不能和“层累说”对话，终是在“自说自话”。王国维在《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中提出“二重证据法”，论说考古与载记的关系，终于使信、疑两派在观念对立的情况之下有了可以深入对话的可能。这种对话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建立真实的上古史，只是信的一方倾向于由考

^① 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198页。



古学证明某些上古史的真实性，而疑的一方则是由疑重新建立一套古史体系，以期得到考古的检验。从这一点论之，他们殊途同归。

二、疑古史与信古史

王国维认为“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故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① 针对当时社会的疑古风气，王国维进而指出：“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承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吾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② 关于禹是否存在，王国维通过对秦公敦“鼎宅禹贄”与齐侯罍钟“成唐……处禹之堵”两个器铭的考证，认为“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③。这种观点虽与胡堇人所说“古史是比较稍近事实的地方却也不少”

①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又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二章》，《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64页。

②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又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二章》，《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65页。

③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又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一二章》，《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66~267页。

相似，但王国维只是以考古材料来论证古史材料之实，并未用古书来证明古史为真。他虽未能将禹史坐实，时人顾颉刚便指出王国维的论证恰好说明“春秋时并没有黄帝尧舜，那是最古的人王只有禹的说法”^①。然而，王国维系统而犀利的表述显然给顾颉刚的“层累说”带来了整体性的冲击。于是，大家讨论的重心便转向考古与载记的关系上来，而对禹的讨论一般则仅作为论说引子，再未对有关禹的具体论点进行过多的细致考证。

李玄伯先生在《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一文中，将“研究前人的往迹所可藉的材料”分为载记、遗作品两种。他认为“辨别书的真伪实是困难，何者绝可用作史料，何者绝对不能用，真是极难的问题”。所以，“用载记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针对顾颉刚、刘澹葵两人所争论的“禹的存在”问题，他认为两人“所引的书籍皆是那两句，实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而只得去问“古人直疑的作品”，所示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②

李氏之说虽从考古出发，但明显过于倾向考古，未能将考古和载记结合起来予以仔细探讨。顾颉刚在《答李玄伯先生》中很明确地说他“颇有尊遗作品而轻视载记的取向”，并再次申说“我以为无史时代的历史，我们要知道她，固然载记没有一点用处，但在有史时代，她原足以联络种种散乱的遗作品，并弥补她们单调的缺憾，我们只要郑重用她，她的价值决不远在遗作品之下。我们现在讨论的古史，大都在商周已降，

^① 顾颉刚《古史新证第一二章·跋》，《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67页。

^② 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68~270页。